

区域动态（东南亚）

【区域动态】安德里亚·本韦努蒂《冷战与非殖民化：澳大利亚如何应对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终结》讨论了英国在东南亚的帝国角色被重新定义以及新的后殖民国家形成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对马来亚、英属婆罗洲领土和新加坡的非殖民化政策以及澳大利亚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性质和驱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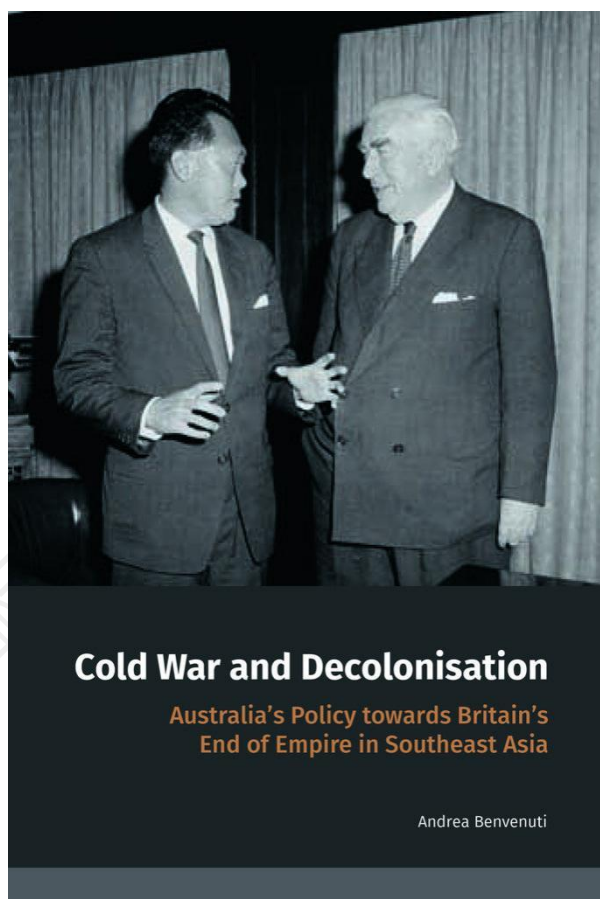
编者按：1955年-1963年间，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帝国终结，在战后“去殖民化时代”，东南亚国家纷纷要求独立自主地塑造自身政治秩序，积极努力摆脱殖民者的影响。衰落的殖民帝国虽希望彻底撤出东南亚以减少开支，但也企图继续在东南亚地区保有控制和影响力，通过在殖民地复制自己的政治体系，主导政治制度，保留外交、安全和内部权力以操纵东南亚的“去殖民进程”。去殖民化和亚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对澳大利亚战后的外交和国防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澳大利亚既不能割断与欧美的历史渊源，也不能改变其地理上与亚洲的联系。太平洋战争之后，澳大利亚为维护“近北地区”的安全，与数个国家一起缔结了“五国联防”协议¹。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政府在该地区承担更大的联邦责任，更深入地参与到东南亚的非殖民化中，这超越了狭隘的安全利益。澳大利亚政治精英们感到有责任协助海峡殖民地、马来亚半岛和英属婆罗洲领土的有序非殖民化。这不能完全用在冷战时期的反共意识形态框架或用前沿防御的工具性逻辑来解释它。在对待东南亚非殖民化问题上，澳大利亚既受对英联邦负责的规范性情感的驱动，也受冷战战略利益的工具性计算的驱动。

本书作者安德里亚·本韦努蒂（Andrea Benvenuti）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和欧洲研究副教授。2017年出版的《冷战与

¹ 五国联防（英语：Five Power Defence Arrangements，缩写：FPDA）是英国、澳大利亚、纽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五个共和联邦成员国在1971年签订的多方协议，主要商讨当马来西亚或新加坡遭受袭击时，协议国采取的反应和所能给予的军事援助。同时它也是马新联合空防系统（Integrated Air Defence System）的一部分，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安全组织。联防军事演习由澳大利亚空军少将负责指挥，指挥基地设于马来西亚皇家空军北海基地。北海空军基地原先由澳大利亚皇家空军所控制，直到1988年控制权才转移到马来西亚皇家空军的手中，不过基地内的飞行器和工作人员是来自五个不同的国家。

非殖民化：澳大利亚如何应对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终结》（Cold War and decolonisation: Australia's policy towards Britain's end of empire in Southeast Asia）是基于1955年4月至1963年3月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官方和外交文件成书。作者强调了孟席斯（Menzies）政府面临的两难境地，即既重视东南亚地区战略意义，又不希望被赋予更多的责任。同时，作者对英国对该地区承诺的持久性始终存在疑问，并担心澳大利亚可能会走上一条必须独自维持的道路。事实上，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当时英国人正在悄悄研究削减东南亚国防开支的方法，一旦对抗崩溃，英国人就会迅速而毫不客气地退出。

该书缺乏的是对孟席斯政府在更广泛的知情辩论和公众舆论背景下的地位的论述。书中几乎没有提到那些年的任何新闻评论或学术分析，但这项研究的优势之一是为澳大利亚人对相关问题的观点提供了新的视角。



《东南亚研究杂志》（*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19年刊载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乔伊·朗（S. R. Joey Long）为安德里亚·本韦努蒂的著作《冷战与非

殖民化：澳大利亚如何应对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终结》与丹尼尔·韦文·蔡（Daniel Wei Boon Chua）的著作《美新关系，1965-1975 年 冷战中的战略不结盟》（US-Singapore Relations, 1965-1975, Strategic Non-alignment in the Cold War）所写的书评。丹尼尔·韦文·蔡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的助理教授。全文选译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对东南亚的局势发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冷战引发的安全担忧以及欧洲殖民帝国的退却吸引了美国等大国介入该次区域事务。东南亚周边国家也制定政策以应对席卷该地区的重大变局。当东南亚活动家和政治家呼吁其他国家提供外交支持和物资援助，以进一步推进其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愿景时，其他国家由此卷入了地区事务。这些力量和干预措施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东南亚社会的政治变革、不确定性和暴力。学者们对其中的一些事态的发展，尤其是对印度支那战争进行了相当详细的研究，但有些问题仍然未得到充分探讨。本文述评的两本著述审视了战后东南亚国际史中两个相对较少被研究的方面。作者们因对学界做出杰出贡献而值得特别赞扬。

安德里亚·本韦努蒂撰写了一本对于理解澳大利亚对晚期殖民地马来亚和新加坡政策历史极具价值的著作。与传统解释不同，作者认为支撑澳大利亚在东南亚地区布控的根源在于其自身的安全担忧，而非寻求与英国共同事业的愿望。孟席斯政府最初对英国退出帝国并将权力移交给马来人和新加坡人的决定并不热心，它担心共产主义代理人和支持者可能会颠覆马来亚和新加坡政府。澳大利亚的官员无法承受这样的结果，他们不希望澳大利亚的战时经历重演，即东南亚敌对势力威胁澳大利亚的安全与福祉。

尽管最初心存疑虑，但澳大利亚人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改变了态度。本韦努蒂写道，澳大利亚最终承认英国官员削弱了颠覆集团的力量，英国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马来亚的叛乱，亲西方的政治组织和领导人也在马来和新加坡掌权。这些事态的发展缓解了澳大利亚对共产主义可能控制东南亚并威胁澳大利亚的担忧。因此，澳大利亚支持英国将政治权力移交给马来人和新加坡人的决定。

澳大利亚对英国非殖民化政策态度的波折伴随着其为塑造东南亚安全局势所做的努力。正如本韦努蒂所写，澳大利亚不仅没有袖手旁观或批评英国的政策，还部署军用飞机支持英国针对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的反叛乱行动，同时承诺以海陆空武装力量支持英联邦。规划者设想建立一支由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战斗部队组成的后备部队，从马来亚和新加坡开展行动，以抵抗马来亚共产党向该地区的扩张。为此，澳大利亚表示，如果战争爆发，将部署

多个师参加战斗。但出于经济和政治原因，澳大利亚最终在东南亚维持的兵力相对较小。本韦努蒂敏锐地指出，孟席斯政府不希望给当地人留下“部署军队是为了维持帝国统治秩序”的印象，为此，澳大利亚官员决定，他们的军队也不被用于反对当地政治领导人。

尽管如此，澳大利亚人仍然对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国内政治保持浓厚兴趣。本韦努蒂通过几章的篇幅来讨论这个主题，讲述了澳大利亚官员对当地政客意识形态倾向的担忧，以及他们当选后可能会损害澳大利亚利益的可能性。由于马来亚反叛者隐藏在偏远丛林中，澳大利亚对他们的活动和意图感到疑虑。托马斯·克里奇利（Thomas Critchley）和大卫·麦克尼科尔（David McNicol）等澳大利亚外交官提交的报告要么希望英国推行弥合马来亚族群分歧的政策，要么表示希望反共团体应与其他志同道合的行为体合作，共同增进他们在新加坡的政治命运。

本韦努蒂较少提及澳大利亚人是否试图直接干预和阻挠他们反感的团体的议程。事实上，他认为澳大利亚人在政治变革的步伐上受到了约束并服从于英国人。最终，国民阵线和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分别在马来亚和新加坡掌权，缓解了澳大利亚的担忧。这些政治组织提出了不损害西方利益的经济和社会政治议程，同时澳大利亚人还发现两国政府都反对共产主义。当1963年两国同意建立“大马来亚”时，澳大利亚支持这一提议。尽管澳大利亚决策者此后不得不对印度尼西亚对马来西亚的反对以及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分离所伴随的问题，但他们最终承认，大英帝国退出东南亚并没有损害澳大利亚的利益和安全。

本韦努蒂的书引起研究澳大利亚对东南亚地区政策的学者极大兴趣。它挑战了澳大利亚行为动机的传统解释路径，不仅很好地揭示了澳大利亚对英国关于帝国非殖民化方针的态度转变，而且提供了澳大利亚对马来亚和新加坡国内政治发展的深刻见解。它利用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档案信息讲述了一个复杂的故事，值得赞扬。全书结构清晰，行文精美。

诚然，本书存在许多令人钦佩的地方，但它仍可将更多材料纳入讨论的范围。约瑟夫·奇夫利（Joseph Chifley）和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为何就共产主义对马来亚的威胁性质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是什么塑造了理查德·凯西（Richard Casey）、托马斯·克里奇利（Thomas Critchley）和阿瑟·丹格（Arthur Tange）等人的观点，并影响了他们与英国官员的互动以及他们对马来亚和新加坡事态发展的评估？如若对他们的个性、偏见、世界观和外交政策方针进行持续的讨论，将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澳大利亚政治和该国政策制定者的复杂性。

该研究还缺乏澳大利亚在马来亚和新加坡开展活动的细节。如能对澳大利亚军队与英国军队和马来亚人的互动进行更详细的考察，可以为澳大利亚对马来亚的看法提供更多见解。调查马来亚对澳大利亚军事行动的反应同样可以揭示澳大利亚行动的影响。值得关注的还有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局的工作。布莱恩·托海伊 (Brian Toohey) 和威廉·平威尔 (William Pinwill) 1989 年出版的著作《沉默寡言的人：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局内幕》 (*Oyster: The Story of the Australian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² 表明，澳大利亚政府派遣秘密特工来削弱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对这个主题的一些讨论可能会给澳大利亚面对英国退出帝国的反应赋予更多意义。

总而言之，对于那些希望了解澳大利亚在马来亚和新加坡行动本质和影响的人而言，本韦努蒂的书可能不太令人满意。不过，当涉及到澳大利亚高层政治时，读者会发现该研究内容详实且有趣。

.....

在更多东南亚文献可供研究之前，学者们将继续利用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记录来撰写该次区域的晚期殖民历史和后殖民历史。当然，采用这种方法来揭示东南亚的过往存在潜在的缺陷。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政府的记录无一例外地反映了其对该地区发展的看法。如果在历史文本中不加批判地复制这些观点，就有可能歪曲当地事件和意图。不过，如果加以批判性的运用，它们可以为研究东南亚的历史提供新的见解。只要历史学家认识到资料来源的局限性和历史记录的个人倾向，就不应该阻止他们利用这些资料构思开展他们的研究。然而，需要用本地视角来平衡或纠正外部观点，这凸显了一个问题，即东南亚国家应该解密相关时段的档案以供学者参阅。如果发现在欧洲列强从该次区域撤退几十年后，撰写东南亚独立的国际历史的可能性依然渺茫，那确实会让人遗憾。

尽管面临挑战，本韦努蒂和蔡还是查阅了可获得的资料，并分别完成了两项值得称赞的研究。他们的作品应该会促进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后殖民历史的进一步研究。他们还应该激励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做出更大的努力来解密他们的档案——当然，前提是不要危及他们的国家利益或信息提供者的利益。未来十年左右，越来越多的研究将在很大程度上严重依赖外国档案，以塑造其对东南亚国际历史的解读。有人设想，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最终会

² 译注：oyster 原意牡蛎，但因外壳紧闭而被引申为“沉默寡言的人”；莎士比亚著作中包含“Why then the world's mine oyster, / Which I with sword will open”，指代抓住所有可能的机会而前途无量，但因该书涉及情报工作，因此译为沉默寡言的人。

意识到，他们可能也希望在这些叙述中表达自己的声音。

(英文原文见 Long, S. (2019). *Asia. Cold War and decolonisation: Australia's policy towards Britain's end of empire in Southeast Asia* By Andrea Benvenuti Singapore: NUS Press, 2017. Pp. 320. Notes, Bibliography, Index. - *Asia. US - Singapore relations, 1965 - 1975: Strategic non-alignment in the Cold War* By Daniel Wei Boon Chua Singapore: NUS Press, 2017. Pp. 304. Notes, Bibliography, Index.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50(2), 289-294. doi:10.1017/S0022463419000080, 编译转载已获授权)

《帝国和英联邦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2019 年刊载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 (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 人文与社会科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怀特 (Nicholas White) 为安德里亚·本韦努蒂 (Andrea Benvenuti) 的专著《冷战与非殖民化：澳大利亚如何应对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终结》所写的书评。全文编译如下：

霍普金斯 (A. G. Hopkins) 最近在本杂志上发表了文章“全球化与非殖民化” (2017 年第 45 卷第 5 期, 第 729-745 页), 这项关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澳大利亚对东南亚日益增长的承诺研究将引起帝国历史学家的兴趣。基于他在“重新思考非殖民化”的相关分析 (“过去与现在”一节, 2008 年第 200 卷第 1 期, 第 211-247 页), 霍普金斯认为在非殖民化的历史中需要为自治领 (Dominions) 提供更多的空间。但是, 诚如本韦努蒂仔细分析所表明的那样, 这不一定是个新国家大胆推行本国外交政策的故事, 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撤离时, 它 (新国家) 才被迫付诸行动。正如霍普金斯所强调的那样, 战后不久澳大利亚明确重新承诺了其帝国的关系 (尽管存在 1942 年的“大背叛”)。帝国联邦的贸易和投资优惠仍然受到高度重视, 这使得马来亚作为英镑地区的美元来源显得尤为重要。直到 1955 年 2 月, 澳大利亚外交部还确信英国不会迅速放弃其殖民责任, 因为在马来亚, “美元收入接近英国本身, 而且单单橡胶一种产品就是英镑地区最大的单一美元收入来源” (第 52 页)。澳大利亚政府在 1950 年对 ANZAM (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马来亚地区) 安排的认可, 证明其尚未立刻转向与美国的国防合作。

这并不是说澳大利亚对英国百依百顺 (堪培拉并非伦敦的“贵宾犬”) ——即使是极端亲英派的罗伯特·孟席斯也绝非“逆来顺受” (第 11 页)。澳大利亚不会全面卷入马来亚

紧急状态 (Malayan Emergency)，这在上世纪 40 年代末被视为民族主义斗争，而非苏联和中国精心策划的阴谋。直到 1955 年，澳大利亚地面部队才投入马来亚，正如本韦努蒂解释的那样，这一决定归因于“一系列复杂的政治、战略和外交因素”（第 20 页），即印度支那局势和英国希望减少其海外防务负担。因此，澳大利亚极力敦促英国在马来亚独立解决方案中达成坚定的防务协议。与军事基地相比，澳大利亚决策者更担心的是新加坡的政治局势。尽管其官员有自由主义倾向，但外交部长理查德·凯西 (Richard Casey) 在 1956 年 2 月认为英国的“离开太过突然”（第 89 页）³。因此，作为削弱新加坡激进主义的一种手段，新加坡与马来半岛合并的方案对澳大利亚变得非常有吸引力，而英国则被认为在推动这一点上做得太少。然而与此同时，在试图减缓或管理非殖民化的进程中，澳大利亚外交官员对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被视为支持欧洲殖民主义或被英国卷入“负担分担”感到焦虑 (第 162 页)。上世纪 60 年代初当“大马来亚”看起来有可能时，印度尼西亚的反对与英国的政策产生了分歧，因为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一直支持与印度尼西亚和解，并接受了印度尼西亚对新几内亚的主权要求。英国向欧洲的靠拢也无济于事，因为人们担心英国撤出之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将扔下新生的马来西亚不管。1964 年 5 月和 6 月，澳大利亚拒绝派遣作战部队与印度尼西亚对抗。只有在 1965 年 1 月，即苏加诺的“危险生活年”（译注：“危险生活年”是苏加诺在 1964 年印度尼西亚独立日演讲的标题中使用的一句话。这句话实际上指的是一个著名的意大利语短语，vivere pericolosamente，意思是“危险地生活”），澳大利亚派遣一个步兵营和特别空勤团 (SAS, Special Air Service) 中队到婆罗洲。1965 年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分裂后，英国希望继续发挥防务作用，但后来被证明是“错位的”（第 256 页）。这迫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 1967 年底开始对东南亚地区的英联邦国家做出永久的防务承诺（主要是试图支持在越南的美国人）。

因此，澳大利亚的政策制定者不希望看到权力在东南亚迅速下放，特别是如果这意味着失去英国防务保护伞的话。澳大利亚不情愿地参与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非殖民化（实际上也参与了其自身脱离英国的非殖民化进程）。在这方面，更多地了解澳大利亚在东南亚的重大利益是很有益的，这似乎促使澳大利亚支持该地区的科伦坡计划⁴（参见尼古拉斯·怀特，

³ 译注：1956 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后，英国宣布了“从苏伊士以东撤退”的政策，此后英国战略收缩逐渐从原有殖民地撤出，在 1957 年至 1963 年间先后撤出锡兰、马来亚、北婆罗洲、海峡殖民地、南也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特鲁西尔阿曼、桑给巴尔、肯尼亚和乌干达。

⁴ 译注：“科伦坡计划”全名“关于亚太地区合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伦坡计划”（英语：Colombo Plan for Cooperativ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简称 CESDAP），1950 年由英联邦国家发起成立，主要致力于人力资源开发以增强成员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目前发展为一个包括南亚、东南亚、东北亚、北美等地区多个国家的国际组织，至 2018 年共有 28 个成员国。

“‘浪费时间和金钱’？20世纪50年代马来亚、新加坡和婆罗洲地区的科伦坡计划”，收录于秋田茂（Shigeru Akita）、格罗德·克罗泽夫斯基（Gerold Krozewski）和渡部昇一（Shoichi Watanabe）主编的《亚洲国际秩序的转型：非殖民化、冷战和科伦坡计划》，阿宾登：劳特利奇出版社，2015年，第87页）。事实上，该计划在第82页的文档中并未得到充分阐述，一些重要的文献，包括大卫·洛（D. Lowe）和丹尼尔·奥克曼（D. Oakman）合著的《澳大利亚和科伦坡计划 1949-1957年》以及丹尼尔·奥克曼的《面对亚洲：科伦坡计划的历史》都没有被引用。同样，鉴于冷战背景下东南亚对日本重建的重要性，澳大利亚与日本的经济和解是否符合这一个框架？尽管如此，凭借对东南亚政治发展背景的细致分析，以及对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档案的深入研究，该书是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非殖民化既有研究的重要补充。

（英文原文见 Nicholas J. White (2019) Cold War and Decolonisation: Australia's Policy Towards Britain's End of Empire in Southeast Asia, by Andrea Benvenuti,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47:1, 188-190, DOI: 10.1080/03086534.2019.1580871. 编译转载已获授权）

策划：东南亚组

编译：杨曦

统筹审校：东南亚组